伽莫夫自传

科学家传记丛书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在敖德萨的童年

在我的家族史中有个神秘的伤痕，好象是我父亲的一个先辈曾(在战斗中)杀死了我母亲的一个祖先，或者是后者杀死了前者。

根据一些现在已散失的古老文件记载，我父亲方面的一位祖先曾是沙俄帝国军队的军官，大约在十八世纪初从彼得堡(现在的列宁格勒)被派遣前去肃清不听指挥的查波洛什哥萨克人。这些人居住在第涅伯河的湍滩与黑海之间的一些岛屿上，他们老是抢劫和攻击波斯人和土耳其人，因而反倒形成了护卫国家的一道屏障。

而在我母亲方面，有一个家系长期担任南方的教士，他们自称是查波洛什哥萨克的子孙。很有可能，我父亲方面的这个先辈不得不在战场上与母亲方面的祖先正面交锋了。

我的外祖父梅特罗波利坦·阿尔赛尼·列别金采夫（这个姓是把乌克兰人的姓列别金涅茨加以俄罗斯化而变来的）是敖德萨大教堂的主神甫，兼任诺沃罗西亚（位于黑海和亚速海北岸的陆地)的宗教管理官员。他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开始自己的神职生涯。1854—1855年，这座城市遭到英国和法国海军的围攻，俄军失守，城市不得不进行疏散。我外祖父遵照指示去河堤上的指定地点等候一条海军划艇将他送上疏散船。他带着自己的全部东西——一只装着衣服的包袱，一本圣经和一幅显示出奇迹的圣像——准时到达那儿。那幅圣像十分珍贵，用延压的金片制成，镂空的部位露出色

彩鲜明的圣母玛丽亚和圣婴的脸和手。从疏散船开出的小艇没能按时抵达，我外祖父站在那儿，眼看着英国和法国的炮弹在空中爆炸（俄国国旗还在那儿飘扬）。这时，一件奇迹般的事情发生了：我外祖父感到一阵剧烈的腹痛，象是要拉肚子，附近有一道篱墙，他可以到那后面去解手，可是自己的东西无人照看，他又感到不放心，恰巧，一个年轻的俄国水手路过那里。

“喂，我的孩子，”我外祖父说，“我到篱墙后面去一下，你能帮我看一下行李吗？”

“行啊，神父。”水手回答。于是外祖父便消失在篱笆后面。

突然一声巨响，一颗敌军的开花弹正好在那个地方爆炸了。外祖父急忙拉起裤子跑了出来，他发现水手已经死去，自己的包袱也被炸毁，碎片狼藉。唯有那幅神奇的圣像依旧完好，只是在圣婴的手上嵌进了炮弹的导管（一种装有引爆炸药的细铜管）。

后来，我的外祖父当上了大主教，这幅圣像就挂在圣门附近的敖德萨大教堂的墙上，导管仍然嵌在圣婴的手上。我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候去大教堂时曾多次见到过这幅圣像，由于铜的表面被氧化了，那个导管已绿迹斑驳。不知道它现在是否还在那儿。

阿尔赛尼大主教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只有一个儿子——维加叔叔——选择了军人职业，成为黑海海军一艘战船的指挥官；伏洛佳叔叔当上了敖德萨法院院长；萨沙叔叔是教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中学教师；而塞尼亚叔叔则毕业于敖德萨大学化学系，致力于海洋湖泊的化学研究，他因发现黑海海底有一层毒害鱼类的碳化合物而赢得了声誉。大主教的女

儿亚历山德拉，也就是我的母亲，成了敖德萨一所私立女子中学的史地教员。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伏洛佳叔叔的儿子塞瓦。我几乎记不得他的模样，因为他在我才几岁时就被绞死了。他随夏帕雷利教授前往意大利学习天文学，在那里参加了一个民粹主义组织。后来，他去彼得堡试图暗杀斯托雷平首相，结果失败了。五名民粹主义者和两个普通的罪犯一起在涅瓦河上被绞死。这个故事在列奥尼德·安德列耶夫① 所著的《七个被绞死的人》一书中有生动描述，书里把我的表兄称为“自称为维纳的无名氏。”② 当然，俄国秘密警察知道他究竟是谁，因此在紧接着的参议院会议上，就有人曾提出质问：“敖德萨法院院长的那个图谋暗杀俄国总理的儿子是怎么回事？”值得庆幸的是，议长恰好是我表兄的教父，他当即起身说道：“这个问题我已查清，是他们认错了人，案子已经了结了。”就这样，伏洛佳叔叔得以保住他的职位直至去世。他死以后，他的妻子娜佳婶婶在沙皇政府倒台前一直领取优厚的抚恤金。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她的养老金自然被取消了，但几乎是紧接着，她又从苏联政府那里领到了抚恤金，因为她的儿子赛瓦

---

①见 Leonid Andreyev, The Seven Who were Hanged(New York: J.S.Ogilvie, 1909)。

②实际上他自称马利奥·卡尔维诺。

③伽莫夫(Gamow)的正确读音是Gamov,其中字母a的读音同“妈妈爸爸”中的韵母。如果我当初是由俄国直接去英国或美国的，我就会把自己姓名英文拼法的最后一个字母写成v。之所以写成现在这个读音易引起混淆的w，是因为我第一次用拉丁字母拼写自己的姓名是为一家德文刊物写稿，在德语中v的发音与英语的f相似，而w则与英语的 v相似。

是在反对沙皇暴政的斗争中献身的。

我的祖父科罗奈尔·米切尔·伽莫夫③是从北方调到南方担任基什尼奥夫军区的司令员的。他也有四子一女，其中三个儿子是军官，分别在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我姑母没有结婚，一直住在她一个当军官的兄弟的家里。然而，我祖父还是尽力把他的一个儿子安东(我的父亲)送进了敖德萨大学，后来他成为敖德萨一所私立男子中学的俄语和俄罗斯文学教员(当时在俄国，“中学”不仅包括高中，还包括相当于美国教育制度的大学一、二年级)。

在我父亲任教的第一年里，他有一个名叫列夫·布朗斯坦的天资出众的学生④，这孩子是班里的佼佼者。我父亲喜欢收集他最好的学生的文章，他把布朗斯坦的一篇作文保存了许多年。可惜的是，这篇作文和他在长期教书生涯中收藏的许多其他文章都已不复存在，在革命时期燃料短缺的年头里，它们被用来生火烧掉了。

可是，布朗斯坦并不喜欢我父亲，他曾组织过一次向校方请愿的活动，要求解雇我父亲。在那样小的年纪上，他就已经是一个出色的阴谋家，他起草的请愿书的字数和班里学生的人数一样多，每个学生用自己的笔迹写一个字。不过，他这一切活动都是徒然的，我父亲仍旧保持着他的职位。

下面摘录我父亲这位学生的一段自传：“进入高年级时，文学课由伽莫夫讲授，他还是个年轻人，满头金发，胖乎乎的，眼睛深度近视。上他的课让人提不起一丁点儿兴趣……更让人不满的是，伽莫夫总是不准时上课，

---

④即托洛斯基。——译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并且会无限期地拖延作文讲评。五年级时，文学课家庭作业得做四篇作文，我对这些作业越来越着迷，不仅阅读教师指定的参考书籍，而且还读一些别的书，摘抄其中的一些内容和段落，对那些能勾起我想像力的句子进行适当的改头换面。我常常以很大的热情来做这种工作，并不仅仅停留在无知抄袭的水平上。还有几个男孩也不完全把作文看成一种让人生厌的功课。”⑤

过了好几年以后，父亲在敖德萨的大街上遇见列夫，交谈中问起他在干什么工作。

“啊，我在船厂工作。”他回答。

“是技术员吗？”

列夫答道：“不，不完全是。”那时我父亲几乎不知道他当年最优秀的学生正在参与什么样的活动。

后来，我来到了人世。1904年3月4日，我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出生在敖德萨我父母居住的公寓里。我长得太大了，而且在母亲的子宫中胎位不正，因此，医生们会诊后决定，在第二天早晨将我切成碎块取出来，以拯救母亲的生命。我十分走运，住在隔壁的一位妇女(她后来成了我的教母)认识一位有名望的莫斯科外科医生(可惜我记不得他的姓名了)，他正在她亲戚的海滨别墅度假，离城大约10至15英里远。于是她半夜里套上轻便马车，赶到外科医生那里，把他从床上唤醒，并且把他连同他的黑色出诊包一起带到了我家。在父亲那四壁立满书架的书房的写字台上，立即进行了这场让我出世的剖腹产。(这也许就是我写了许多书的原

⑤摘自托洛茨基的《我的一生》(纽约：Charles Scribners Sons，1930)第74页。布朗斯坦参加共产党后改名为托洛茨基，这原是他母亲——敖德萨剧院的一位著名女演员——的艺名。

因吧。）

一个女仆打着盏煤油灯，那位邻居妇女(我后来总是管她叫“干妈”)在厨房间里消毒手术器械，而我父亲就象天下所有的父亲在这种场合下那样爱莫能助。就这样，谢天谢地，我总算来到了这个世界。

七岁时，我开始看凡尔纳的作品(不如说是母亲念给我听)，我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去月球旅行，这真是一个充满孩子气的梦，好在现在我已经完全醒来了。在这个年龄，我就做过某种物理研究——试着做一个电铃，把一个普通的小铃铛(就象圣诞老人雪橇的驯鹿带的那种小铃)和一节电池连在一起。

九岁时，母亲去世了，我从此开始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是个歌剧迷，常常用口哨吹出《弄臣》、《浮士德》和《黑桃皇后》等歌剧中的咏叹调，或者用男中音哼哼。他总是要我陪他去歌剧院，却始终没能激起我对歌剧的兴趣。只有一次，我热切地巴望着去歌剧院看《鲁斯兰和柳德米拉》，这是根据普希金的一个美丽的故事改编、由格林卡谱曲的歌剧。故事中，柳德米拉公主在新婚之夜被黑巫师从床上偷走。悲伤的新郎——名叫鲁斯兰的著名骑士——四处寻找她，他历尽千辛万险，终于找到了黑巫师那座具有魔力的城堡，并将他杀死。自此以后，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便幸福地白头偕老。

我偏偏想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想听)这出歌剧不是没有原因的。鲁斯兰在找寻他那被夺走的新娘的漫长旅行中，曾遇见一颗被砍下的巨人脑袋，它还活生生的。(顺便提一句，我的书架上虽然有高高一摞《叶甫根尼·奥涅金》的各种英译本，可是我却一直没能找到一本《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英译本，实在是遗憾！)这骇人的情景出现在一个黄昏，鲁斯兰正

骑马穿越大平原寻找他的新娘。粉红色的落日渐渐消失，一轮新月已在空中升起，平原上雾气朦胧，异常寂静。突然，隐隐约约地象是有一座小丘在向他逼近，并且越显越大，还伴随着响亮的鼾声。鲁斯兰的座骑鬃毛竖立，颤栗不已，不肯再向前一步。这时月亮从云层中钻出，小丘显得清晰起来，勇敢的骑士眼前出现了一幕奇景：一颗巨人脑袋伸出肉乎乎的血红舌头向他挑逗。鲁斯兰怒不可遏地将他的矛猛力向舌头掷去，不偏不倚，正好刺中舌头的中央。那脑袋又是震惊，又痛不可耐，发疯似的想把矛咬掉，鲁斯兰抓住这一机会，疾驰到脑袋的一侧，用裹着铁甲的手对准脑袋的面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脑袋被打翻在地，来回滚动着，在它原先那个地方，鲁斯兰看见一把寒光闪闪的巨大魔剑，只有用它才能够斩断巨人头颅(这已经做到了)，也能削掉巨人的兄弟——黑巫师(绑架柳德米拉的那一个)——那把藏有他全部魔力的长胡子。很久以前，黑巫师(他比他兄弟更精明)砍下了巨人的脑袋，把剑藏在它下面，他断定不可能有人会拿到它。现在鲁斯兰手里握着这把魔剑，终于找到了黑巫师的城堡，削去了他颌下那把长胡子。就这样，他同新娘破镜重圆，从此过上幸福生活。

正象上面提到的，我之所以对这出歌剧产生特别的兴趣，是想看一眼这绝妙的巨人头颅的尊容。我父亲在剧场的右侧订了一个包厢，可是很不走运，巨人的脑袋偏偏也在舞台的那一侧。我可以清楚地看见骑着一匹真的黑马出现在舞台左侧的鲁斯兰，然而不论我怎么努力向外探出身子，却仍然看不见巨人的脑袋。我不由得哭了起来。这时父亲发现有几个朋友占据着位置较佳的包厢，便抓住我的胳膊．拉着我飞快地向那儿跑去，可是我们进入朋友的包厢时，大幕正在

徐徐下落，我所能看到的只是巨人脑袋上的胡须尖。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三年之后又发生了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我那时是个中学生，却难以受到正常的学校教育，因为学校常常停课，不是敌方军舰炮轰敖德萨，就是希腊、法国或英国远征军在城里的主要街道对壕沟中俄方的白军、红军、甚至绿军发动白刃进攻，再不就是各种颜色的俄军之间相互战斗。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日渐长进。记得有一天，我正坐在家里的一扇窗前阅读一本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书，蓦地一颗炸弹在附近街上爆炸，冲击波把窗玻璃震得粉碎。尽管如此，学校生活还是在动荡中继续下去，慢慢地，我对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在革命之前以及敖德萨被白军占领期间，宗教在一切学校中都是必修课，我作为大主教的外孙，理应是班里的尖子。指导我们宗教课的是来自邻近教堂的神父，他得意地把我叫做“执事”⑥。可是，我在学习宗教教义问答手册、诵读各种祷词以及学唱复活节赞美诗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嫉妒那些犹太孩子，他们可以借口不上宗教课跑到校园里去打球。

一天，父亲给我买了一台小显微镜(廉价商店出售的那一种)，我就决定做一个重要的实验来检验宗教教义究竟正确与否。在俄国教堂里，圣餐时所用的红葡萄酒和加在里面的面包被说成是救世主耶稣基督的血和肉。有一次，神父用镀金汤匙舀给我少许化为圣体的葡萄酒加面包块，我把一块碎面包粘在面颊上，一溜烟跑回家去，然后把它放在显微镜

---

⑥执事是教会中的一种职务，其任务是帮助神父做些具体工作。——译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下观察。为了比较起见，我事先已准备好一些与它差不多的蘸有红葡萄酒的面包屑。我在显微镜下比较两种样品，却看不出它们有什么区别。两种面包的结构完全相同，可是与我皮肤的结构却没有丝毫相似之处（皮肤样品是我用一把锋利的刀子从手指尖上削下来的）。我从教堂带回的面包样品依旧呈红色，只可惜我那显微镜倍数不够大，辨别不出单个的红细胞，这样我只完成了证明的一半，尽管如此，我却认为，正是这次实验使我日后成为一名科学家。

在革命的那些年头里，各种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先是红军，白军，马赫诺匪帮，霍乱流行，接着又是红军，德国人占领，饥饿，斑疹伤寒，新经济政策(由列宁推行)，紧接着又是饥饿……，但最糟糕的是缺水问题。敖德萨城座落在黑海北岸高原的脊架上，离海平面150英尺。海岸陡峭，几乎是直上直下。下面是一条狭窄的陆地，排列着船坞码头、店铺和一些从事跨越黑海进行海上贸易的机构。沿着脊梁是一条长长的林荫大道，站在大道上，远处和近处美丽的海景尽收眼底。一条宽阔的石阶路使人们可以自上走下海边，又由下面返回城市。凡是看过俄国老片子《波将金号战列舰》的人，可能会记得水兵和船坞工人们攀爬这条宽阔的、有几百级陡直台阶的石级路攻打城市的场面，他们是冒着上面警察部队的枪林弹雨往上爬的。但这些事情发生在1905年那次失败的俄国革命时期，当时我还在襁褓之中，对这一事件茫然无知，同样也只能借助那部电影得到一些印象。我是在好几年以后成了敖德萨学校的学生时，才真正熟悉这些闻名遐迩的台阶的。

提起敖德萨的历史，我还说得出一段故事。这座城市是俄国女皇凯瑟琳一世在十八世纪末建成的，那是俄国军队赶

走居住在黑海北部沿岸的土耳其人和鞑靼人，并把这片土地并入俄罗斯帝国以后的事情。这一地区被命名为诺沃罗西亚（新俄罗斯），居民主要是乌克兰人和来自北方的农民。据说，凯瑟琳一世雇用的法国工程师曾劝她不要在那块地方建城，因为那里高出海平面150英尺，并且又不靠河，以后会得不到淡水供应。然而凯瑟琳是个专制的女皇，听不进任何违背她意愿的建议。她说，那里会有"assez d eau"的（即充足的水）。这几个法文按音节倒过来读（即读成eau-dzes-sa），读音很象"敖德萨"，这个城市也就因此而得名。当然，这不过是一则传说，一个笑话而已，因为谁都知道，这块地方最初（公元四世纪）原本是希腊的一个领地，当时就叫做敖德萨斯。可是相信这一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传说又何尝不可以呢？

然而，现实中的敖德萨除了偶然降些雨而外，总是十分干旱，人们不得不从大约25英里远的德涅斯特河往城里运水。

亚历山大·S·普希金曾经写道：

在潮湿的敖德萨，
有样东西让人抱怨不休，
它是什么你可知道？
淡水金贵如油！
只是为了喝水，
父老兄弟、叔叔邻居辛劳奔走。
不必发愁，敖德萨人，
放松，放松！……
反正美酒免税进口⑦。

---

⑦敖德萨是个自由港。

淡水起初是每天用几百辆马拉的水车从德涅斯特河往回拉，后来铺设了一条长长的粗水管，由座落在德涅斯特河边上的电厂抽水输入敖德萨城。水泵需要燃料，煤得从几百英里之外的顿涅茨克地区的煤矿运来。可是由于铁路遭到破坏，燃料常常不能按期运抵，水泵也就闲置在那儿，起不了作用。海边的船坞能引入一些水，但是没有足够高的压力能把水提升到150英尺以上供应城市。这样，为了弄到最低限度的饮用和做饭用水(没人能顾及洗澡)，敖德萨的市民们只好走下几百级石阶去船坞打水。在那儿，水从公共龙头里慢慢地往下滴。人们得等上一个来小时，才能灌满两只水桶，然后提着它们蹬几百级台阶，把水拎回家中。那时我正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每天得干这件苦差事，它耗去我大量的学习时间。一天，我在排队等水的时候和英国驱逐舰上的一个水手搭上了腔，他的船就停靠在公共水龙头附近的船码头上。

“这是干什么？”他问道。

“我需要水。”我用蹩脚的英语回答。

“到这儿来，小伙子。”水手说着把我引到军舰上，他接过一根橡皮水管，只用几秒钟就把我的两只桶灌得满满的。看到这一情景，整条队伍里那些渴坏了的敖德萨居民都学我的样，涌向水手，而这位皇家海军的水手也真是不厌其烦，把所有的水桶都灌满了。我们满怀着对英国海军的感激之情，拎着这珍贵的水，一级一级地爬这几乎没有尽头的石阶，往家里走去。可是一进家门我们却傻了眼，这水是从敖德萨港湾抽上来的普通海水！从这件事以后，我算开始领会这样的英国式幽默了。

另一个困难问题自然要推面包，这在当时十分短缺，严

格按定量配给。可是另一支占领军成了我们的救星。法国的摩洛哥人部队在仓促撤离敖德萨时留下一大批喂骡子的食料，我的植物知识有限，叫不出这种“谷物”的名称。第二天，它们就被运往敖德萨的各个面包房，用来烤制面包，以填塞市民们的辘辘饥肠。供应是相当充足的，每一个排在队伍里的人都能领到一条又粗又长的“法国面包”。可是，人们很快就发觉这种东西简直难以下咽——也许只有法国骡子除外吧。日子尽管艰难，可敖德萨人并没有丧失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编了这么一首小诗：

面包师玻什的面团，
多么美味，多么稀软，
它可修补高统胶靴，
还能用它把窗户粘。

最后，还有一个难题，就是取暖和做饭用的燃料问题。黑海的北岸是覆盖着旱生青草的宽旷的平原，连一小片树林都没有。敖德萨林荫大道两旁的树木和美丽的公园里的树木都是当年建城时种植的。这些挺拔壮观的洋槐树给城市披上了葱翠的绿衣，每逢开花季节，空气中总是弥漫着芳香。可是所有的树(连同许多古老的木结构房屋)都被砍伐掉，用作燃料。整座城市变得光秃秃的，毫无色彩。在法国革命期间，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在著名化学家拉瓦锡被推上断头台时曾说过：“砍去这颗脑袋只需一刹那，可是要再产生一颗相同的脑袋，恐怕等一个世纪都不够。”我已有几十年没回敖德萨了，因而无法描述它今天树木的情况。

关于粮食问题还可以再补充一些。当时城里在闹饥荒，但产粮的农村却不存在这种危机，农民们都藏匿囤积一些粮食。因此要想搞到一些面包黄油、甚至一只小鸡，还是有办

法的。你可带上一些丝手帕、几件家用银器、或是一块金表步行到离城不太远的村庄去，用这些东西换取食物。许多有胆量的城市居民都进行这种交易，尽管得冒点风险。

我的一个朋友曾对我说过他的一段亲身经历。他叫伊戈尔·塔姆(195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当时是敖德萨大学一名年轻的物理教授。在红军占领敖德萨时期，有一天他跑到邻近一个被马赫诺匪帮的一支部队占据的村庄（当时马赫诺匪帮的士兵常在农村出没，骚扰红军），在他和一个村民为了六把银匙能换多少只小鸡讨价还价时，匪兵看见了他的城里人装束，就把他带到头头那儿。这是个满脸胡子的家伙，戴一顶高高的黑皮帽，宽阔的前胸交叉着两条机关枪子弹带，腰里别着两颗手榴弹。

“你这个狗杂种，你这个共产主义煽动分子，你想颠覆我们乌克兰祖国，对你的惩罚是处死。”

“啊不！”塔姆慌忙分辩，“我是敖德萨大学的教授，来这里只是想弄点吃的。”

“胡说！”那个头头吼道，“你算哪门子的教授？”

“我教数学。”

“数学？”头头说，“好吧，那你给我算算，要是把马克劳林级数取到第 n 项，会产生多大的误差，算出来就放你走，算不出就枪毙你。”

塔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分明是属于高等数学一个相当专门的分支学科里的高深问题。他哆哆嗦嗦地在枪口下算出了答案，交与头头过目。

“正确”。头头说，“现在我看出你真是个教授了，回家吧！”

这个人是谁？谁也不知道。如果他后来没有被杀死的

话，那么他现在很可能正在乌克兰某座大学里教授高等数学呢。

在中学里学习数学和物理学的同时，我还花一些时间阅读俄罗斯文学，大部分是诗歌，而不是散文，因为诗歌的音调要和美得多，并且不那么冗长。（你比较一下《奥涅金》和《战争与和平》的字数就知道了。）

我对人名和数字的记忆力特别差，可是对于诗却只要读上几遍，便长久铭记不忘，哪怕是很长的诗也不例外。几年前，我去圣迭戈看望几个俄国朋友，曾跟他们打了个赌，我说我凭记忆能够一口气至少背一个小时的俄国诗歌，结果我赢了，我一连背了一个半小时，最后停下来不是因为我肚子里的诗源耗竭了，而是因为听众都听得疲惫不堪。第二天我受到了惩罚——嗓子发炎，迫使我取消了那天晚上的讲课。

我对幼年时期的一些儿歌依然记忆犹新，例如：

铃儿叮当！铃儿叮当！
小猫家里起火了，
母鸡从井里打来了水，
火扑灭了，铃儿叮当。

还有

鸟儿，鸟儿，你在哪儿？
我在喷泉边一宿未眠，
喝着伏特加，一杯又一杯，
直到舌头象胶一样粘。

上中学时，我的兴趣转向比较严肃的诗歌，我想在这儿以及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引用一些片断，这倒不是为了炫耀我的记忆力，而是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与各种历史事件——个人的及政治的——有着密切联系。我在选诗的时候发现，

在我打算引用的诗歌中，只有少数曾译成英文，许多诗是以俄文原文印刷出版的，从未翻译过，而更多的诗则从未出版过，只是在口头流传，作者情况不得而知。于是我请我的妻子巴巴拉(她是美国人)来帮助我完成这项任务。我先把诗从俄文译成英文，写下来交给她，由她再将译文改写成英文诗。读者在本书中遇到的那些未提及作者及译者的诗，都是以此法炮制的。

下面这首诗是亚历山大·勃洛克在1918年写的，属于俄国革命早期的诗歌，它展示了这场广阔的运动的某些侧面：

‹十二个›⑧

黑色的夜。
白色的雪。
风呀！风呀！
人的脚都站不住。
风呀，风呀——
吹遍了上帝保佑的全世界！

风在散步，雪在飞舞，
十二个人在走着路。
嘴里——衔着蹩脚的烟卷，军帽乱戴着，
军帽乱戴着，
背上应该绣上菱牌的花样⑨，
自由，自由，
唉，唉，没有十字架啦！

冷呀，同志们，冷呀！
……

1143842

China

我们的孩子们
到赤卫军去服务——
到赤卫军去服务——
抛下那颗狂暴的头颅！

唉，你，苦中苦，
甜密的生活！
破旧的外套，
还有奥地利的枪炮！⑩

我们要叫所有的资产阶级吃吃苦，
我们要煽起世界的大火，
那血中的世界的大火——
主啊，求你庇护！

……十二个不信仰圣名的人⑪
向着远方走去，
他们为了一切都准备好，
他们什么都没有惋惜……

他们的钢枪
向着那隐藏的敌人……
就在黑暗的小街上，
那儿正刮着风雪……
就在那鹅毛似的雪堆里——
靴子陷进去都拖不出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